



王剑锋◎著

中国赶超型体制

——基于历史成因与宏观经济
失衡的研究

Catching-Up Like China—Historical Origin
Macroeconomic Imbalance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

光明日报出版社



王剑锋◎著

中国赶超型体制

——基于历史成因与宏观经济
失衡的研究

Catching-Up Like China—Historical Origin
Macroeconomic Imbalance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赶超型体制：基于历史成因与宏观经济失衡的
研究 / 王剑锋著. --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10
ISBN 978 - 7 - 5112 - 5478 - 8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体制—
研究 IV. ①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2426 号

中国赶超型体制：基于历史成因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研究

著 者：王剑锋

责任编辑：钟祥瑜

责任校对：张明明

封面设计：中联学林

责任印制：曹 净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 话：010 - 67078248 (咨询)，67078870 (发行)，67078235 (邮购)

传 真：010 - 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 - mail：gmcbs@gmw.cn zhongxiangyu@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210 千字

印 张：13.5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12 - 5478 - 8

定 价：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结构性失衡问题始终贯穿于我国的宏观经济实践。但在2000年之前,由于中国经济的绝对水平还比较低,后发优势带来的潜在增长空间还比较大,因此宏观经济失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矛盾还不是特别突出。而在近十几年中,尤其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刺激政策实施过后,宏观经济失衡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约束问题开始愈加明显。在这当中,内部经济失衡主要包括,产业结构中工业部门的比重过高,国民收入分配日益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在国民储蓄率提高的同时居民收入和消费比重却日益下降。而外部经济失衡,则主要表现为经常项目顺差的迅速增长。

应该说,导致上述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国际因素的冲击,也包括一些我们自身的因素,尤其是一些体制性的因由。而对于中国目前的体制性桎梏,已经有不少学者从各自感兴趣的角度做过探讨,但时至今日,还缺少针对该问题的系统性总结,尤其是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历史内在关联性的分析还有待深入。

在笔者看来,“赶超型体制”是理解我国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枢纽。该体制形成于计划时期,但其基本架构及其影响下的政府行为逻辑,一直延续至今而并未进行根本性的调整。与此同时,这一体系结构对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宏观经济表现的影响,又会随着外部条件的不同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出现调整。从这方面看,计划时期政府偏向工业的政策设计及其带来的高工业比重和短缺经济、因面临经济封锁而被强制平衡的对外贸易收支,与当下的政府工业偏

好及高工业比重、贸易顺差所反映出来的过剩经济、居民消费比重偏低,都是同一体制对不同国际条件和意识形态变化而做出自我调适的结果。

按照作者的分析,对于赶超型体制的观察包括两个维度,一是所谓“赶超型体制”的内涵及历史来源,二是在赶超型体制下中央地方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正是在这两个层面制度安排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才在不同时期经历了表现各异但却共同带来失衡特征的宏观经济表现。当然,宏观经济失衡的领域很广,涉及的方面很多,为了分析上述两个层面的经济影响机制,我们仅从中选择近年来经济生活中较为突出的两类现象予以分析,一个是赶超型体制对于产业结构、国民收入分配以及经常项目顺差的影响,另一个是赶超型体制下中央及地方财政分权关系变化在税收高增长中的作用。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赶超型体制的内涵、历史来源,旨在梳理中国经济增长的体制背景。第二部分包括二、三、四、五共4章,以对经常项目顺差变动的探讨为核心,主要论及赶超型体制对于产业结构失衡、收入分配以及对外贸易收支失衡的影响。第三部分包括六、七、八、九共4章,在首先指出税收增长与税基增长相偏离这一事实基础上,探讨了体制性因素对于征收率进而税收增速的影响机制。最后一部分则基于赶超型体制视角提出若干改革建议。

在有关中国体制的演进与改革路径探讨方面,客观地讲,赶超型体制有其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应对军事威胁,同时借鉴苏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较之资本主义世界的较好经济表现,选择赶超型体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其实施所带来的若干历史后果也为1979年后增长潜力的释放提供了重要基础。改革开放后,对赶超型体制的维持,则可能主要来自政府执政绩效的需要。但无论如何,只有从历史角度分析赶超型体制出现的“合理性”,才有可能为政府体制转型找出一条可能而且可行的路径。

在研究逻辑和内容安排上,部分内容使用了最近几年中已有研究,并在史料和逻辑等方面进行了拓展,还有一些章节则是结合最新的研究心得推出的新内容。总的来看,本书对赶超型体制经济影响的刻画仍然是初步的,无论从史料、形式化以及实证角度都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也真诚地欢迎同仁们的

批评和指正。

我的导师安体富教授始终关心我的研究,每次见面都询问我各方面工作的进展情况,借此机会对安老师表示敬意。还要感谢丁志杰教授、郭红玉教授、齐天翔教授、吴军教授、邱兆祥教授、丁建臣教授、栗勤教授等学院领导、老师和同事,在工作期间给予我的关心、指导和支持。另外,南开大学的邓宏图教授、陈国富教授、钟茂初教授、龚关副教授、雷鸣副教授、邹洋副教授,上海大学的顾标博士、中国社科院的彭兴韵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程永宏副教授、财政部的李建民处长、吉林大学的丁一冰教授、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党军教授、商务部的李伟研究员和刘峪处长、同济大学的胡景北教授、东北师范大学的史桂芬教授,曾以各种形式对全书或其中部分研究内容提出过宝贵建议,在此表示谢意!最后,还要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BYJA790114)及对外经贸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CXTD4-04)为本书提供的支持。

王剑锋

2013年6月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赶超型体制的内涵、历史来源及其影响机制概览	1
一、赶超型体制的内涵、历史来源与增长模式	/ 1
二、赶超型体制下的地方增长激励	/ 10
三、赶超型体制对宏观经济失衡的影响机制概览	/ 17
第二章 政府工业偏好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的 理论分析	20
一、政府工业偏好的形成机制	/ 20
二、政府工业偏好影响产业结构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理论分析	/ 28
第三章 中国产业结构与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体制成因	40
一、地方政府间经济竞争的影响	/ 43
二、纵向分权不当激励的影响	/ 47
三、“生产性”税制结构对地方政府产业选择偏好的影响	/ 50
四、减税政策的局限性分析	/ 54
第四章 赶超型体制对经常项目余额的影响	60
一、“内外经济关联”研究视角的选择	/ 60
二、分权体制下的信贷约束变动对贸易顺差的影响机制	/ 69
三、中国产业结构与经常项目余额变迁的经济史分析	/ 80
四、实证检验	/ 92

第五章 赶超型体制下经常项目顺差与房价之间的正反馈机制	100
一、赶超型体制下的政府地价级差及其对贸易顺差的影响	/ 101
二、贸易顺差影响中国房价上涨的基本面分析	/ 110
三、地价级差制度的正反馈强化效应	/ 116
第六章 体制安排影响税收增长的证据:税收与税基增长间的偏离 ...	119
一、经济因素的界定	/ 120
二、估算方法	/ 122
三、实证分析	/ 125
第七章 中央地方间的收入分权对征收率的影响机制	132
一、已有理论模型的简单评介	/ 133
二、政府课税努力影响税收增长的作用机制:一个简单模型	/ 140
第八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对税收征管约束能力的变迁过程	147
一、分税制改革前征收率下降阶段的分析	/ 147
二、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征收率上升过程	/ 161
三、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影响税收增长的国际经验:俄罗斯的例子	/ 164
第九章 中央和地方政府行为影响税收增长的实证分析	168
一、中央征收集权的影响	/ 168
二、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影响	/ 177
第十章 基于赶超型体制的改革建议	185
一、降低中央政府的经济增长偏好	/ 185
二、继续深化经济分权改革	/ 186
三、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 188
四、改革土地价格的政府干预机制	/ 190
五、赶超型体制视角下的金融体系改革	/ 191
六、农村及农业体制的调整	/ 192
参考文献	195

第一章

赶超型体制的内涵、历史来源及其影响机制概览

一、赶超型体制的内涵、历史来源与增长模式

本书对于赶超型体制的定义主要有两方面的理论依据,一是 Johnson (1982) 和 Meredith (1999) 分别结合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的实践,相继提出的“发展型国家”及“开发型国家”的概念,二是王绍光(1997)基于国家能力的概念对于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的探讨。“赶超型体制”包括如下主要特征:第一,中央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赶超意识;第二,政府控制着重要的经济资源;第三,垂直的行政管理体制;第四,除了财政激励以外,中央还对地方官员实施以经济增长为重点的晋升激励。

而从赶超型体制的历史形成过程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在有关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决策中,无疑会受到自身禀赋状况的基础性制约,但除此之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执政集团知识结构以及所处国际环境,也具有重要影响并可能使其与自身的禀赋优势发生偏离。新中国成立后,长达十几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经济与社会稳定两个方面对中国造成了极大伤害,在此背景下,饱受战争煎熬的中国民众对新政权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而大体在同一个时代,与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相对照,苏联却利用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高速增长。显然,无论是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启示作用,还是苏联在特定时期成功的经济实践,都会引导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政府认为,利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的作用,完全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快速增

长。与此同时,为了与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重要成员的中国,也面临着短期内必须实现经济国防实力快速增长的直接压力。由此,“高速”与“赶超”就自然成为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中的核心内容。^①

在关于经济发展实际路径的选择方面,列宁有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的有关论断,以及同时代的发达国家都是工业高度发达国家的实际观察,都使得中国将迅速提高工业化水平确定为重要目标。而在工业部门内部,作为机器设备和钢铁等基础性工业原材料的提供者,重工业部门始终具有核心和枢纽作用。然而,面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的现实,又使中国无法通过国际经济交往从外部获得足够的重工业产品,其间屡次面临战争威胁的现实,^②也进一步推动中国必须着力建设所谓门类齐全的重工业体系。重化工业优先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由此成形。^③

在以工业化为主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形成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落实这一发展战略。而无论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强国的历程,还是苏联工业化的经验都表明,落后国家在外有列强压迫、内无充足资金的情况下,要想迅速实现工业化,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当然,日本和苏联两

① 总的来看,尽管受到不同时期对于经济增速的设定有所不同,但中国从“一五”到“四五”这四个五年计划中都贯彻了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原则,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腾飞。

② 1964年8月,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紧接着轰炸越南北方,把侵越战争的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针对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三五计划草案中明确提出“立足于打仗,抢时间,改变布局,加快建设以钢铁和机械为中心的基础工业,加快三线建设。在四五计划制订中,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战备气氛更加浓厚,为抵御苏联军事威胁的“大三线建设”成为了主要任务。四五计划草案中明确指出,“要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强大的战略后方;狠抓钢铁、军工、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

③ 在1954年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则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我们才可能制造现代化的各种工业设备,使重工业本身轻工业、农业机械、交通工具、国防得到技术的改造。同时,只有在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显著地提高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不断地增加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生产,保证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国在“政府主导”程度上是存在差别的。^①但对新中国而言,显然,无论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还是出于与苏联维持良好关系的考虑,都会采取政府主导经济型的苏联模式。^②为了实现政府主导型的管理体制,并在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中国政府必须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1. 筹集工业化所需资金的政府制度安排

在这一系列制度安排中,一个必须实现的中心环节是筹措到工业化所需的大量资金。而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从根本上断绝了中国从西方世界获得大量资金援助的可能性。尽管进一步争取苏联的经济援助具有重要作用,但朝鲜战争同样表明,即使想依靠苏联也是靠不住的。^③中国政府必须尽快建立一个能够在国内低成本筹措工业化资金的体制安排。很显然,作为当时比重最高的农业部门,必须充当提供工业化资金的主要部门。为了“打通”国民收入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管道,中国政府设计了如下四项制度。第一,1953年颁布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统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由于农产品是重要的工业原材料和工人生活物资,这一具有“低价格”、“垄断”两个突出特征的制度安排,为压低工业成本提供了可能。第二,1956年出台的《国营企业、事业和机关工资等级制度》,也即八级工资制。这项制度赋予了政府统一掌管城市职工工资标准、统一组织城市职工工资调配的权力。政府通过压低工资标准,降低了城市职工的工资水平,工业的劳务投入成本又一次被降低了。第三,计划价格制度。工业品的销售价格水平,长期高于农副产品的统购价格水平,即所谓工农产品“剪刀差”。在低成本和高售价的基础上,国有工商部门获得了相对的高额利润,农业部门的国民收入被转移到国有工商业部门。第四,《财政统收统支管理体制》。在财政统收统支管理体制下,国有经济单位的利润要交由财政集中支配,自身能够自主支配的财力极其有限。通过财政上的统收,“汇集”在国有经济单位中的高利润便转移到了政府手中,形成了财政收

① 苏日两国政府都采用政府出资的方式建立工业其行业,但两者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日本政府待这些企业正常运转后,很快将其出售给了私人部门,苏联模式中政府则保持了国有形式。

② 刘国光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5、8页。

③ 刘国光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9页。

人和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①

2. 取消农业土地私有制、实行工商企业的国营化

在土地所有权以及农业合作组织建设方面,尽管刘少奇“先有工业化而后有农业生产社会化”的看法,与毛泽东“先改变所有制,然后发展生产”存在着对经济发展次序的争论。但如果从服务于工业化资金筹措这个目标角度看,先改变所有制无疑是必需的。其道理显而易见,个体农业的存在等于承认其私人权利,很难与低价垄断收购农产品的制度相容。同样,出于保证被工商企业汇集的利润能够进一步转移到政府手中,对工商企业实行国营化是重要的制度保障。为此,除了没收官僚资本以外,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必需的。

3. 高度统一的金融机构体系

在金融领域建立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在实际工作中是服从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而在认识上,则受到了《共产党宣言》中有关论断的影响,认为大银行是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银行,银行必须国有化。^② 另外,苏联对上述原则的率先实践也无疑产生了重要示范效应。在上述背景下,非国有银行机构逐步被取消。从1952起,先后经过“建立公私合营银行”以及“公私合营银行与当地的人民银行储蓄部合署办公”等步骤后,最终于1956年7月,将公私合营银行从根本上纳入了中国人民银行体系,不再作为专业银行性质而独立存在了。^③ 随着大一统金融体系的建立,政府完全将信贷掌握在手中。这意味着,政府除了可以通过财政统收统支制度获得较高的收入比重以外,对不属于政府所有的居民储蓄资金,也要纳入政府调控范围。

上述制度安排不仅为高超型发展战略提供了支撑,还产生了一系列具有重要经济影响的历史后果。

主要影响一:高储蓄率

按照马克思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中国选择了工业化路线和重工业优

① 高培勇(1995)、林毅夫(1994)对此已有过论述。

② 杨希天,《中国金融通史(第六卷)》,81页。

③ 杨希天,《中国金融通史(第六卷)》,83、84页。

先的赶超战略。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通过干预国民收入分配形成较高的储蓄率,以保障高投资所需的资金需求。

表 1-1 各个时期部分典型国家及国家组别的储蓄率

	50 年代	60 年代	70 年代	80 年代	90 年代	00 ~ 10 年
世界平均	-	-	22.35* (75 ~ 79 年)	21.82*	21.73*	21.19*
高收入国家	-	-	22.47* (75 ~ 79 年)	21.57*	21.10*	19.81*
中等收入国家	-	-	-	24.02* (82 ~ 89 年)	25.18*	28.32*
低收入国家	-	-	-	13.63* (81 ~ 89 年)	16.71*	22.25*
主要国家统计						
中国	29.1* (52 ~ 59 年)	26.6	35.0	35.0	40.2 48.4	
加拿大	24.20* (58 ~ 59 年)	22.59*	22.14	20.19	17.40 21.94	
法国	-	23.21* (68 ~ 69 年)	19.63*	18.70	19.40	19.65
日本	-	-	25.0 (71 ~ 80 年)	32.04	31.02	25.69
韩国	-	-	28.38 (76 ~ 79 年)	32.31	35.97	31.44
新加坡	-	-	31.22 (72 ~ 79 年)	39.64	48.55	45.06
美国	-	18.98* (63 ~ 69 年)	19.44	17.00	16.58	14.13
德国	-	23.83* (64 ~ 69 年)	22.10 (71 ~ 79 年)	19.82	20.95	22.82

续表

	50 年代	60 年代	70 年代	80 年代	90 年代	00 ~ 10 年
英国	-	20.25* (63 ~ 69 年)	19.96	16.84	15.44	14.46
巴西	-	-	19.42 (75 ~ 79 年)	21.15	15.98	17.00
印度	-	-	19.80 (75 ~ 79 年)	21.12	24.08	32.56
印度尼西亚	-	-	-	26.45 (81 ~ 89 年)	25.60	27.46
马来西亚	-	-	26.19 (74 ~ 79 年)	25.11	35.30	34.74
墨西哥	-	-	21.83 (79 年)	21.61	19.18	23.10
菲律宾	-	-	27.23 (77 ~ 79 年)	18.99	20.32	25.67
罗马尼亚	-	-	-	21.90* (83 ~ 89 年)	18.38	21.30
俄罗斯联邦	-	-	-	28.04* (87 ~ 89 年)	28.70*	29.47

数据来源:中国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核算资料 1952 ~ 2004》。其他国家和组别的储蓄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各个国家在各时期中的储蓄率,按照该期间总储蓄之和与总 GDP 之和之比计算得到,由于总储蓄未提供不变价数据,因而采用了当期价格数据。“*”代表相应时期的储蓄数据缺失,以储蓄率的简单平均值代替。日本 71 ~ 80 年的数据来自弗兰科·莫迪利安尼:《生命周期理论与中国的居民储蓄》,《比较》第 22 辑。

表 1-1 显示,在各国数据较为齐全的 70 年代,中国的储蓄率高于其他所有的国家和组别。该时期中,中国的简单平均储蓄率为 35%,而在大致对应的时期,全部国家的该指标仅为 22.37%,在单个国家中,最高的新加坡也仅为

31.22%。即使在80年代和90年代,新加坡由于实行高比重的强制公积金政策,使其储蓄率超过了中国,但在2000年以后,中国又超过了新加坡。就70年代的情况而言,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的人均GDP低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在理论上消费支出应该占更高比重这些因素,在储蓄率上高于其他国家是很难实现的。这无疑反映了政府主导型经济管理体制通过控制国民收入分配,在提高积累率方面的巨大作用。在1982~2010年期间,中国及高、中、低、全部国家四个组别的数据齐全。中国的简单平均储蓄率为41.79%,而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以及所有国家的该指标分别为20.66%、26.05%、17.85%以及21.51%。

主要影响二:相对服务业的高工业比重以及重工业在工业部门中的高比重

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实施中,政府投资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倾斜。以“一五”计划为例,在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中,工业部门投资占58.2%。其中又以重工业为主,比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重工业投资的比重还要大。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88.8%,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11.2%。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两者比重分别为85.9%和14.1%。^①重工业优先的投资安排带来了两个结果,一个是工业部门相对服务业的高比重,另一个是重工业在全部工业中占据了过高的比重。

① 李富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引自《建国以来经济发展和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621,630页。

表 1-2 各个时期部分典型国家及国家组别的工业和服务业比重(占 GDP,按不变价)

	60 年代		70 年代		80 年代		90 年代		00 - 10 年	
	工业	服务业	工业	服务业	工业	服务业	工业	服务业	工业	服务业
世界平均	-	-	32.14	56.80	28.81	60.33	27.54	62.14	26.44	63.24
高收入国家	-	-	32.07	59.24	28.37	63.08	26.57	65.08	24.27	66.97
中等收入国家	-	-	32.11	44.28	31.24	47.12	32.54	48.38	34.85	49.66
低收入国家	-	-	18.84	40.99	19.39	43.63	19.17	43.96	22.15	44.83
主要国家统计										
中国	21.71	13.29	29.67	22.30	33.54	33.92	42.60	37.69	48.36	40.87
加拿大	-	-	36.50	60.68	33.49	64.20	31.53	66.42	29.30	69.03
法国	-	-	24.51	62.98	21.18	66.66	19.38	68.41	16.71	62.71
日本	-	-	36.66	59.60	33.15	64.35	31.31	66.97	28.27	70.05
韩国	-	-	20.23	61.34	27.67	57.34	30.32	55.71	33.58	53.16
新加坡	-	-	11.55	34.57	18.45	60.71	17.57	63.22	17.17	65.10
美国	-	-	28.90	70.04	23.92	75.10	22.14	76.93	20.38	78.58
德国	-	-	37.42	49.33	32.84	54.07	28.41	59.03	25.92	63.42
英国	-	-	31.32	57.47	28.64	59.10	26.80	61.43	20.86	67.64
巴西	25.36	44.78	27.72	47.95	27.89	48.24	24.69	52.76	23.15	58.24
印度	21.60	31.59	22.68	33.96	23.95	37.40	25.10	42.22	25.85	50.40
印度尼西亚	24.17	36.41	35.52	34.03	37.55	39.27	43.97	39.82	43.54	42.08

续表

	60 年代		70 年代		80 年代		90 年代		00 - 10 年	
	工业	服务业	工业	服务业	工业	服务业	工业	服务业	工业	服务业
马来西亚	-	-	35.95	38.86	39.06	41.52	44.52	44.31	44.81	47.25
墨西哥	30.27	55.52	31.31	56.98	30.18	58.91	31.64	59.05	31.03	60.20
菲律宾	32.46	47.53	37.81	44.74	37.64	46.42	34.95	50.39	32.81	54.04
罗马尼亚	-	-	-	-	-	-	24.75	55.57	25.50	56.87
俄罗斯联邦	-	-	-	-	-	-	36.30	51.60	32.85	50.99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数数据库。其中 20 世纪 60 年代的巴西和墨西哥仅为 65 - 69 年的数据。